



逢年过节是各地赌博高发期，武汉警方日前在当地“城中村”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。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三面环水的湖中孤岛赌博，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“城中村”拆迁户。是何原因让刚脱贫的农民变成赌桌上的“常客”？又是何原因让他们由朴实节俭变得挥霍无度？采访中记者发现，拆迁群体暴富之后各种后遗症正在逐渐显现，赌博、吸毒、挥霍之后再度返贫等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关注。

[发言]

一夜暴富的拆迁户
一夜输光该怪谁

2012年1月，杭州警方所抓获的赌博团伙中，被立为刑事案件的就有60个。这些团伙的主要“捕猎”对象，是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的村民。拆迁造就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村民群体，而这些村民拿拆迁款赌博，也成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。很多人因此一夜致贫，甚至居无定所。

那一夜暴富的拆迁户往往又一夜输光，这仅仅是因为赌博团伙设局下套吗？

赌博团伙贪婪成性、掠夺财富固然是非法勾当，其遭遇雷霆打击、法律制裁也是罪有应得。特别是，这些团伙往往处心积虑地设局下套，诱人涉赌，直至不能自拔，其戕害人心的恶劣情状，莫过于此。

不过，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。首先要指出的是，不能将参赌村民完全视为受害者。几乎每一场或大或小的赌局，参与赌博的村民都有或多或少的责任。仅仅谴责设局者，不仅不客观，也不能真正杜绝层出不穷的赌博团伙，更不能消除源源不断的村民赌徒。

大批村民手握巨额财富，却无所事事，人生目标模糊，只剩下吃喝玩乐，一旦遇到外来诱惑，自然容易上钩。

其次，社会对这一群体缺乏足够关注，在客观上放任了人性中恶劣一面。那些一夜暴富的村民中，很多人或者无业可就，或者干脆就不愿再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。这种与正常社会疏离、割裂的情形，一方面使其难以接受积极信息；另一方面，也给赌博团伙以可乘之机。

目前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大批拆迁户，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，可相应的社会管理却还没有跟上，更不要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了。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里，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应该与时俱进，根据社会结构、居民状况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公共政策，要做到未雨绸缪，而不是事后弥补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新华社发 蒋跃新 作

拆迁户成赌桌上“常客”

“暴富”之后路在何方？

[现象] 孤岛成聚赌窝点

据警方介绍，设在孤岛上的赌场位于武汉城郊的左岭街黄陂岭村。空置的砖瓦房内，设有一张5米长桌，摆着各种赌具。长桌旁，“皇帝”“荷官”招呼着下注。另一边，赌客们将一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“压大小”。后面够不着的，直接将百元钞票甩到桌上下注。

警方接到线报后，佯装渔民撑船暗中侦查，摸清了赌场规律。赌场每天下午两点开张，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。赌客由两三辆小面包车

来迎接。只有一条小路进场，到了路口赌客都得下车步行入场。

警方通过从水上和陆上围合，包括赌场老板田某在内的40余名涉赌人员全部被擒。经审讯，田某、肖某、袁某三人都是湖北赤壁人，系赌博公司骨干成员。田某交代，逢年过节，是开场子捞钱的黄金时段，不久前，他和同伙在武汉周边四处“考察”，相中了这里的“岛上空置房”。

参与案件侦破的武汉东湖高

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负责人说，这个团伙还没有专人揽客，“他们多找附近有闲钱的农民参赌，拆迁户是他们的重点对象。”

一位在事发地点附近居住多年的詹先生透露，左岭自从进入政府的拆迁规划后，赌风日盛。“牌打得大。一般半天能输赢两三千元。到了春节，赌博公司更是明目张胆，在村里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就摆上桌子，搭起简易赌场。”

[追踪] 拆到哪，赌博公司就跟到哪

事实上，左岭街只是众多“城中村”的缩影。记者在武汉一些“城中村”采访时了解到，村民因“拆”一夜“暴富”，面对突如其来财富，一些拆迁户守不住“钱袋子”，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“商机”，先用小利引诱，慢慢拉人入局，使其越陷越深。

武汉市人大代表、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告诉记者，“城中村”聚赌很常见。拆迁拆到哪里，赌博公司跟到哪里。一般在一个村里可以设两个赌场。有的空房子外表很破，里面可能就有赌场。

“连我们这种已改造完的‘城中村’都被他们‘进驻’了。赌博公司到还建小区里租了一层楼

开赌场，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，村里5名村民现场被抓。”陈军说，“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。赌红了眼，一天要输上百万元，没钱了，找‘放码’公司借高利贷，利息按天算，千分之五，怎么还得起？”

额头湾一名40多岁姓陈的村民，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元补偿款，还抵掉一套还建房。他因还不清高利贷，上街持枪抢劫，被判了七八年。剩下家中3个小孩，重病的母亲，仅靠老婆在加油站打工生活。

记者了解到，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。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，年收入不到

8000元。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。2010年，“城中村”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。每户除还建房外，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，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。

“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。”陈军说。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，不少人像“千斤扫街富婆”余友珍一样，保持本色，把钱看得很紧。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，把钱看得松些，一有钱心就“乱”了，又没有技能，部分人就沾染上了赌博习气。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，也不找工作，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，天天呼朋唤友、吃喝玩乐。

[反思]

“拆二代”不能成为垮掉的一代

从温饱线上挣扎到手握巨额财富，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持现金挥霍的赌场豪客，部分拆迁户心理失衡、行为失当，在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，除了归结到人性的贪婪，更多的还在于教育的缺失与现代理念观念的普及度不够。

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渔业村党支部书记胡明荣说，城中村改造让村民变市民。但现实是，农民缺少技能，文化素质较低。6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是文盲，年轻人多是高中文凭，工作技能低，只能找到环卫工人、保安、餐馆服务员等职业，他们至少得二代、三代才能融入城市。

采访中记者看到，虽然大多数村民只在从事千元以下的工作，却普遍买了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。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、长丰村到处不时看到奔驰、宝马等豪华车。

陈军说：“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，钱花得莫名其妙。”一个姓韩的村民过穷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，一拆迁就离婚了。男方租房再婚，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，不工作吃山空。

有村支书告诉记者，拆迁户这一社会群体在暴富后出现“高原反应”，因缺乏教育和引导，精神生活匮乏，“手握财富就懵了”。现在出现了返贫苗头，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。

据新华社电